

說

文

學

說文學

專

題

研

究

專題研究

黎千駒 著



说文

专题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文学专题研究 / 黎千驹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 - 7 - 5004 - 8394 - 6

I. 说… II. 黎… III. 说文解字 - 研究 IV. H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3710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290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序

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理路殊异；科学著作与文学创作，内蕴迥别。古今文墨之士，专擅一技者，不乏其人，时有所见；兼具异能者，不无有之，为数不多。黎君千驹立于后者之列：既从事抽象思维，而撰写学术论文；亦进行形象思维，而创作文艺作品。他赠予的书，有专著，有小说，有诗集。其论证之思绎，其构想之灵觉，其吟哦之情趣，浏览之余，印象鲜明。

回忆相与黎君，倏忽已逾十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黎君拟评论文字训诂学术进展状况，特发专函，询问研究成果，乃闻大名。然而，津湘遥隔，未得谋面。尔后，书信往还，神交之中，于黎君之为学始有所了解。及至二〇〇一年八月，我所主持的中国文字学研究中心为纪念许慎撰著《说文解字》一千九百周年，本着推动学术交流以促进学术研究之旨趣，主办“首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致函邀约，黎君专程北上与会，乃得相晤。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迄今已相继举办四届，黎君热忱参与，每届均拨冗莅会，提交论文，献出成果，论辩中畅所欲言，与学者们相互切磋。不止于此，每届研讨会圆满结束后，黎君都认真撰写关于各种学术成果交流、不同学术见解争鸣的综述文章，传播学术信息，沟通学术观点，均登载于敝研究中心刊行的《文字学论丛》与《说文学研究》各辑之首，发挥了积极的学术效用，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

当今有关文字的学术行为，承继着往古重视文字的优良传统。周秦之际，课字发蒙，析字言理，训字通经，尝说解文字。汉平帝时，征召天下通小学者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这同现时邀集文字学家聚首一堂的文字学研讨会颇为相似。汉代去古已远，隶变造成了古文字演化为今文字的剧变，通读经书存在文字障碍。而隶书之通行，“俗儒鄙夫，玩其所

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于是，经学大师、文字学家许慎撰著《说文解字》一书，“叙篆文合以古籀”，“稽诂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剖析构形，说解本义。（《说文·叙》）

在学术史上，许慎撰著的《说文解字》，超越原有字书的窠臼，开启了中国文字学的新篇章，具有科学系统，富有实用价值，流布久远，影响深广。其见重于世，或为学者所援引而笺注经籍，或为学者所仿拟而新编字书，或为学者所研索而深究义理。汉魏以降，薪火相传，继承发展，不断演进，遂形成为专门之“许学”，亦称之为“《说文》学”。一千九百年来，成果丰硕，积淀深厚，堪称华夏文化乃至人类文明之瑰宝，是足资发掘的珍贵遗产。故此，追踪《说文》学的进程，回顾文字学的沿革，旁搜博采，爬罗剔抉，客观评介自古及今的《说文》学的流派，审慎评断往古来今的《说文》家的得失，则自然是有其学术意义的。二〇〇五年十一月，我应邀赴许慎故里出席“首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遵照主办者安排而宣讲《关于〈说文〉学的现代化研究》，即将此列为主要研究任务之一。（载《许慎文化研究——首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与《说文学研究》第二辑）而在此之前，敝研究中心即以此为课题而定为研究项目，约集学者协力探讨。黎千驹教授即为主力之一。

在协作研究中，黎千驹教授承担了两个子课题：二为关于“探究‘六书’旨意之著述”的评介，一为关于“分析《说文》字体之著述”的评介。他积极从事讨索，查检文献，搜集资料，分析内容，参验比照，鉴别短长，进行评议，如期撰写成篇，切实予以介绍。黎千驹教授勤于探求，继此延展，扩大视野，将研评推及源流、书体、字体、词汇、词义、体例等方面，而缀辑为《说文学专题研究》。作者运用现代学术观点，比较全面而系统地梳理和点评了历代学者研究《说文》的有关成果，同时对现代说文学研究的动态也作了介绍，指出了说文学的发展趋势。这将有助于了解说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拓宽人们研究《说文》的视野，推动说文学研究朝着健康的方向深入发展。当然，或许有学者对其中的个别评断持异言，这是可以彼此辩难而求得共识的。

黎千驹教授之治学，思维活跃，精力充沛，奋勉进取，笔耕不辍，正值年富力强，必将多有所获。

斯著付梓之前，黎君向我索序，聊陈浅见，命笔赘之。

向光忠 谨叙

己丑端午前夕于南开园笃学斋

序

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一部伟大作品。

中文之所以异于西文，最明显的不同就表现在：西文是以音记词，词与词之间有明确的空格标记；汉文是意寓于字，只有字的不同，却难以区分词的界限。由于这点的不同，西文的教学和研究是从词开始的，而中文的教学和研究则是从字出发的。正由于此，两千年来的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讨论的是字。只要把字的形、音、义弄明白了，文章也就自然明白了。许慎说，“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这段话不仅总结出文字在教学和阅读中的重要意义，还阐明了文字对于文献超越时空流传的重要意义。由于汉字的这个超越时空的特点，今天的读者只要具备文言文常识，阅读汉代乃至先秦时期的古文献，就不会感觉有多大的困难。即使是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基本上也都是可以解读的。而《说文解字》这部经典的字典，在开创字典辞书和沟通古今方面的意义之重大，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

许慎首创汉字部首归字法，把当时可见的上万个汉字的形体逐个地分析，归纳为 540 个部首。在汉字学的建设上，许慎最大的功绩，就在于他通过对汉字的形体分析，发现了汉字构形的内在联系，正如王宁先生所指出的，许慎“总结出小篆构形的总体规律，描写出小篆构形的完整系统，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如络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许慎之后，人们对于汉字的认识，就不再是散沙般的一个个形、音、义有别的符号，不仅每个汉字都有它所属的部首，而且部首与部首之间的排列次序，也是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的。从而，任何一个汉字都是在汉字的整个系统中有其特定的地位；而且，每个汉字的部件构成方式，也是有一定规律的。这种规律，许慎阐述为“六书”。所以我们可以把许慎看做是汉字学领域的门捷列夫，他所归纳的部首系统，就相当于汉字系统的“元素周期表”。许慎科

学地揭示出汉字内在的系统，其功绩是伟大而不朽的。

许慎撰写《说文解字》的本意不仅在于对所有汉字字形结构的分析，还在于对全汉字的释义，揭示了汉字字形与字义之间的内在联系。许慎说：“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矣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说文》从一开始就是为着正确解经、纠正错误的目的而撰写的。两千多年下来，乃至至今，《说文》一直是训释经典和各种古书的重要依据。

《说文解字》的重要性，引起了历代小学家和现代学术界的重视，造就了《说文》研究在学术史上的突出地位，从而造就了“说文学”的诞生。研究《说文》的专著，据刘志成先生所撰《中国文字学书目考录》所收录，光是以“说文”为书名首字的著作就多达489种。这种状况大概是没有其他著作可以相比的。面对如此多的《说文》研究著作，简直令人感到无所适从。黎千驹教授的《说文学专题研究》，正是把读者引入说文学殿堂的先导。

黎千驹教授的《说文学专题研究》在体例上也给学术界带来新的启示。大凡学术史和专题文化史著作，几乎都是以时代为纲、以问题为目来编撰的。这种体例必然使同一个问题的阐述分处于人为规定的不同的时代中。这部《说文学专题研究》也属于学术史，其显著的长处在于突破以时代为序的框架，采用了以问题为主线，以历代研究者的学术传承为阐述目标的体例。本书这种体例使得种种专题讨论的源流更加明晰，阐述更加深入，检索更加方便。本书还专门开辟一章，辑录作者对于历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概况的综述文章，给读者带来许多有关汉字学和说文学的新信息，使读者受益匪浅。大凡学术研讨会，闭幕之前总是要对研讨会加以总结的。但急就的总结报告难免粗疏，会议之后重读会议论文，在此基础上修改总结，就能给学术界提供最新的学术研究动态和信息，这个办法是撰写学术著作的新创举，很值得发扬。

受黎千驹教授之嘱，我有幸先拜读了这部著作，略有感触，姑且作为序言吧。

詹鄠鑫

于2008年12月29日

目 录

第一章 说文学源流及其发展趋势概说	(1)
第二章 六书学研究(上):六书学源流研究	(15)
第一节 古代六书学研究	(15)
第二节 现代六书学研究	(29)
第三章 六书学研究(下):六书各书体研究	(42)
第一节 历代象形研究	(42)
第二节 历代指事研究	(48)
第三节 历代会意研究	(56)
第四节 历代形声研究	(64)
第五节 历代转注研究	(79)
第六节 历代假借研究	(100)
第四章 《说文》字体研究	(114)
第一节 《说文》中小篆研究	(115)
第二节 《说文》中重文研究	(125)
第五章 现代《说文》词汇研究	(139)
第一节 《说文》同源词研究	(139)
第二节 《说文》同义词与反义词研究	(149)
第三节 《说文》方言词研究	(154)

第六章 《说文》词义研究	(157)
第一节 唐五代时期《说文》词义研究	(158)
第二节 宋元明时期《说文》词义研究	(167)
第三节 清代《说文》词义研究	(173)
第四节 现代《说文》词义研究	(180)
第七章 《说文》体例研究	(201)
第一节 《说文》部首及每部之字排列的体例	(201)
第二节 《说文》说解的体例	(204)
第三节 用系统论来重新审视《说文》中的阴阳五行学说 ——揭秘《说文》“隐性”的说解体例	(207)
第四节 《说文》旁见说解研究	(219)
第八章 说文学研究动态	(235)
《说文》研究的新进展 ——首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说文》研究综述	(235)
慎思创新 和而不同 ——第二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42)
释疑补阙考证精 究理探源观点新 ——第三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51)
后记	(266)

第一章

说文学源流及其发展趋势概说

《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东汉许慎著。《说文》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说解字义、分析字形、标明音读的字典,是我国第一部杰出的文字学著作,也是一部杰出的训诂学著作。为了使这部著作“信而有证”,许慎“博采通人”,“考之于(贾)逵”,历经近20年,终于在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完成了《说文解字》,后又反复修改达20余年。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许慎将修订好的《说文解字》委托儿子许冲献给皇上。

《说文解字》原书早已残缺,五代时南唐徐锴曾对《说文解字》加以整理而写成《说文解字系传》,通称小徐本;北宋初年,徐锴之兄徐铉奉诏对《说文解字》加以整理而得出定本《说文解字》,通称大徐本。现在一般使用的是大徐本。

《说文解字》大徐本全书分15卷,其中第1—14卷为正文,第15卷为序目。每卷分上、下。共收字9353个,重文1163个,总计收字10516个。《说文》的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创部首编排法;用六书的理论来解释文字,确立了六书的体系;保存了大量的古文字资料;保存了古音古义;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依据等五个方面。

(一) 首创部首编排法

《说文》把所收9353字按汉字的形体和偏旁结构分列540部,首创部首编排法,从而奠定了汉字字典的编排体例。段玉裁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谓分别为五百四十部也。……许君以为音生于义,义着于形。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圣人造字实自象形始,故合所有之字,

分别其部为五百四十，每部各建类一首，而同首者则曰‘凡某之属皆从某’，于是形立而音义易明。凡字必有所属之首，五百四十字可以统摄天下古今之字。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若网在纲，如裘挈领，讨原以纳流，执要以说详，与《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杂乱无章之体例不可以道里计。”^①从这个意义上说，《说文解字》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字典，并对后世的字典编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用六书的理论来解释文字，确立了六书的体系

“六书”的名称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由此可知“六书”作为“六艺”中的一门学科，最初是用来教育公卿士大夫子弟的。至于“六书”的具体名称，《周礼》并没有说明。

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在其《周礼·地官·保氏》注中引用了郑众的说法来指出六书的具体名称和次第：“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以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郑众和班固虽然说明了“六书”的具体名称和次第，然而并没有具体解释六书，更没有运用六书的原理去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许慎是对“六书”作界说的第一人，也是自觉地系统地运用六书的理论来解释汉字的第一人，从而确立了六书的体系。自《说文解字》问世之后，“六书”理论就成为了传统文字学中的一个基础理论，也是核心理论，甚至还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六书学。六书几乎成为了任何一个研究《说文》的人都不可回避的课题。

（三）保存了大量的古文字资料

《说文》以小篆为主作为分析对象，从而既完整地保存了小篆的构形

^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叙注》。

系统，又对小篆进行了规范化的整理，因为“汉人用字多通借，……实以无分部之字书，故至于歧异耳。《说文》既出，而用通借之字者少矣”^①。《说文》中还有1163个重文。这些小篆和重文不仅为人们“以形索义”提供了古文字依据，同时也为后世学者研究甲骨文和金文架设了桥梁。

（四）保存了古音古义

《说文》释音，主要是通过对字形的结构分析而建立起了比较严密的谐声系统；《说文》释义，主要是解释词的本义。《说文》所保存的古音古义，为古文字学、汉语语源学和古音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五）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依据

汉语是汉文化信息的载体，而汉字又是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并且具有“以义构形”的特征，因此汉字的构形中也就必然蕴含着丰富的汉文化信息而成为汉文化的载体。《说文》中所保存的小篆系统，也蕴含着丰富的汉文化信息，人们可以据此来研究古代的文化。例如：民国时期程树德先生撰写的《说文稽古篇》，就是根据小篆来考证古人生活习俗的。陈寅恪先生于1935年曾致信沈兼士先生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②可以说汉字是考察中国古代文化的活化石。然而，欲通过汉字来考察古代文化，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准确地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而《说文》对九千余汉字进行了形体结构分析，并且绝大多数的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应据此为基本依据而参以甲骨文和金文等古文字来进行汉字形体结构分析，再结合文献资料和文物材料来考察汉字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如果不利用《说文》，“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而只能“望文生训”。

许慎撰写《说文》的目的，是为学习经艺服务的。学习经艺则必须先明文字，许慎认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于是作者“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诂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为

① 陈澧：《东塾读书记》。

② 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2页。

达此目的，在说解体例方面，作者一方面通过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分析来说明造字的本义，以便纠正“俗儒鄙夫”对文字的荒谬说解，从而帮助人们正确地理解经艺；另一方面，经艺中涉及了先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一切内容都必须通过词语来表达。为了准确地探求经艺中的词义，于是许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①。由此可见，《说文》所训释的词义，是“六艺群书”中的意义，它所反映的是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文化现象，因此我们就可以根据《说文》对词义的训释来了解古代的文化。

毋庸讳言，由于时代的局限，《说文解字》也有一些不足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是首创部首编排法，而要把九千多字分别纳入五百四十部首之中，在编排体例方面难免不够科学。例如“伐”归人部，而“戍”归戈部，“吠”归口部，而“鸣”归鸟部等。二是由于许慎是以小篆为主来分析字形和说解字义的，因而对字义的说解难免有不准确之处。例如：把“为”说解成“母猴”，把“行”说解成“行走”，把“止”说解成“下基”，把“元”说解成“始”等。随着甲骨文字的大量发现，人们不断地利用甲骨文来纠正《说文解字》中的某些说解错误。

瑕不掩瑜，正因为《说文》具有上述五个方面之价值，所以《说文》诞生之后很快就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并逐渐引发了一门学科——说文学的诞生。

一、说文学源流

说文学的诞生和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孕育期、诞生期、兴盛期和创新期。东汉末至北宋初是说文学的孕育期，宋元明时期是说文学的诞生期，清代是说文学的兴盛期，现代是说文学的创新期。

（一）东汉末至北宋初：说文学的孕育期

东汉末至北宋初开始对《说文》进行了多方位的初步研究。这主要

^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叙》。

体现在引用《说文》以注经，仿照《说文》编排体例而编撰字典，勘正、注释《说文》，对《说文》条例、小篆、释义以及六书等进行初步的研究等方面。

第一，引用《说文》以注经。例如：东汉的经学大师郑玄在注释《周礼》、《仪礼》、《礼记》时就曾引用《说文》来解释词义。《周礼·考工记·冶氏》：“戈广二寸……重三鈞。”郑玄注：“玄谓许叔重《说文解字》云：‘鍰，鈞也。’今东莱称或以大半两为钩，十钩为环，环重六两大半两。鍰鈞似同矣，则三鈞为一斤四两。”郑玄在注释《仪礼·既夕礼》和《礼记·杂记上》时，皆引用《说文解字》“有辐曰轮，无辐曰轮。”

第二，仿照《说文》编排体例而编撰字典。例如：（晋）吕忱著有《字林》。该书共收 12824 字，其中保留了《说文》所收之字，另外增补了《说文》未收之字以及异体字。所收之字按照《说文》540 部编次。南朝（梁）顾野王著有《玉篇》。该书是奉梁武帝之令编撰，其目的是考证古今文字训诂异同，以释读者疑惑。该书共收 16917 字。宋真宗时陈彭年等人奉旨重修，定名为《大广益会玉篇》，即今本《玉篇》，共收 22516 字。《玉篇》所收之字按照 542 部编次，其中 13 部与《说文》不同，排列顺序亦不同。该书释义，不以《说文》所释本义为限，又广采《方言》、《广雅》以及群书训诂加以补充该字义项。《玉篇》保存了当时大量的新词新义和读音，开创了先注音后释义的说解体例，为我国第一部楷书字典。

第三，勘正、注释《说文》。例如：唐代李阳冰作《刊定说文解字》、南唐徐锴作《说文解字系传》、北宋初徐铉作《校定说文解字》等。

第四，对《说文》条例、小篆和释义进行初步的研究。例如：北齐颜之推对《说文》的条例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许慎检以六文，贯以部分，使不得误，误则觉之。……大抵服其为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元注书，往往引其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① 唐代李阳冰治小篆 30 余载，他认为《说文》小篆在流传过程中已

^① 《颜氏家训·书证》。

有讹误。在大历时期“于是刊定《说文》，修正笔法，学者师慕，篆籀中兴”^①。由此可见，李阳冰对《说文》小篆所做的“修正笔法”的工作，是对那些书写不规范或不正确的篆文所进行的修正。李阳冰还对《说文》词义的训释进行了研究，他对许慎的某些说解敢于大胆怀疑并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即“别立新义”。虽有不少错误，但并非一无是处。南唐徐锴校订《说文解字》而成《说文解字系传》，他从“证明”、“阐释”、“补充”和“订正”四个方面对《说文》的释义进行了研究。证明《说文》释义者，主要体现在引经籍证明《说文》释义的正确；阐释《说文》释义者，主要体现在或阐释《说文》说解中某个字的意义，或阐释《说文》说解中某个构件的意义，或阐释《说文》的整个释义部分，或阐释《说文》说解中某个事物名称的古今变化，或阐释《说文》形体结构分析的理据，或阐释形体结构等，从而使《说文》的释义更加彰显而易知；补充《说文》释义者，主要体现在或补充引申义，或补充古今用字的不同，或补充同义词的分辨，或补充同源词的系联，或补充文字与意义的变迁过程等；订正《说文》释义者，主要体现在或订正《说文》形体结构分析之讹误，或订正《说文》版本在形体结构分析时之脱漏。徐铉也在他所校订的《说文解字》中增加了注释，并标以“臣铉等曰”为别。我们将在本书第六章“《说文》词义研究”第一节“唐五代时期《说文》词义研究”中对此展开论述。

第五，对六书进行初步的研究。例如：徐锴在《说文解字系传》中还对“六书”进行了阐发，提出了“六书三耦”说。他认为“大凡六书之中，象形指事相类，象形实而指事虚。形声会意相类，形声实而会意虚；转注则形事之别。然立字之始类于形声，而训释之义与假借为对。假借则一字数用，如行（荃）、行（杏）、行（杭）、行（沆）；转注则一义数文，借如老者，直训老耳，分注则为耆、为耄、为寿焉。凡六书为三耦也”^②。徐锴的“六书三耦”说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与价值：首先，第一次从动态的角度对六书进行了划分并提出了划分的标准，这样就使得人们不再把六书看成是一个静态的平面的概念，它具有动态性与层

① 徐铉：《上说文表》。

② 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上”字注》。

次性。其次，把六书划分为三耦，给后人深入研究六书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综上所述，东汉末至北宋初开始对《说文》进行了多方位的初步研究，其代表人物为李阳冰、徐铉和徐锴。这标志着说文学进入了孕育期。

（二）宋元明时期：说文学的诞生期

说文学诞生的标志主要体现在形成了一支研究《说文》的队伍，继续仿照《说文》编排体例而编撰字典，大胆怀疑许慎的说解而往往自创新义，开始利用古文字资料来解说字义、对六书相当关注等方面。

第一，形成了一支研究《说文》的队伍。该时期研究《说文》的专家众多，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南宋郑樵、戴侗，元代杨桓、周伯琦，明代赵搢谦、魏校、吴元满、杨慎、赵宦光等。

第二，宋元明时期继续仿照《说文》编排体例而编撰字典。例如：（宋）司马光等著有《类篇》。该书为王洙、胡宿、张次立、范镇等人相继修纂而成，最后由司马光整理并献给宋英宗。该书共收 31319 字，重文 21846 字，按照《说文》540 部及次第编排。该书既继承《说文》、《玉篇》的系统，注重古音古训，说明古今文字形体的演变，又广收新字。（明）梅膺祚著有《字汇》。该书共收 33179 字，把《说文》540 部首简化为 214 部，部首次第和每部中的字皆按笔画排列。此种编排体例为后代字典所效仿，并成为字典编排的主要方法。张自烈著有《正字通》。该书主要是为补正《字汇》的缺漏和错误而作。

第三，宋元明的学者敢于大胆怀疑许慎的说解而往往自创新义，开始利用古文字资料来解说字义。例如：戴侗《六书故》认为《说文》小篆有字形之讹，不能分析造字本义，于是他就改用金文来分析。唐兰先生曾这样评价戴侗：“他用金文作证，用新意来解说文字，如‘鼓’象击鼓，‘豆’字才象鼓形之类，清代学者就不敢采用，一直到清末象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等书才称引。”^① 杨桓认识到小篆有形体的讹变，于是改以金文、籀文为标准来分析字形结构以探求本义。周伯琦著《六书正讹》，

^①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2 页。